

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

《呼声》编辑部

前言

第一部分 理论与展望

列宁和领导权：

1905革命中的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党.....1

先锋队理论中的卢森堡.....24

《呼声》编辑部关于组织问题的谈话.....35

第二部分 实践中的知识分子

作为流放者的乔治·奥威尔.....43

在法西斯主义阴影下：

贾科莫·布拉内洛的共产主义之路.....48

深耕者与鼓动家：中国农民大王彭湃.....56

前　　言

鉴于目前的形势，《呼声》编辑部决定将自己成员参与写作、翻译的一些文章编入这部小册子中。

书如其名，这本文集讨论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即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在目前的中国，这个问题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只有依靠从阶级社会的天上抛入人间的知识分子，我们才可能首先组建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才能谈论更长远的计划。无论是主张马上“到工人中去！”的那些“革命实践”的爱好者，还是仅仅希望别人当出头鸟的缩头乌龟，都是这部小册子的批判对象。

小册子里并没有太多直接讨论现在应该“怎么办？”的内容——这是另一部我正在写的小册子要讨论的事情了。这里采取的策略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的各个侧面来描绘问题的整体形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是研究已经沦为往日云烟的历史，回到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的是崭新的未来：共产主义的过去与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我曾读到的这段文字说的一样：“读经典不仅仅是写作课上的重读，而且还促使我们书写他人的文字，也就是说，它是让我们试图理解‘昨日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留存至今，以及在对分隔古今的时代的审视中理解古人的光影在当代人类境况中还能反映什么的对他人文字的反思（和书写）。”

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几乎主要都是在谈理论，或者说是一种理论史。这部分由《呼声》编辑部成员在去年的两场对话收尾，可以当作是编辑部对理论和目前问题的概括，或曰“展望”。

第二部分完全由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人物小传组成，其中有熟悉的，

也有完全陌生的。奥威尔和贾科莫·布拉内洛恰好组成了一个对子，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路向。至于彭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先驱之一，他的事迹不仅仅应该作为一些玩笑或传说存在，而是应该被我们研究，从中提取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像布拉内洛、彭湃等等革命家的传记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牺牲就合上了书页，这后面的部分是由我们先进行阅读和思考，最后再用革命的墨水增补上去的。

杜临
2023年3月11日

第一部分

理论与展望

列宁和领导权：

1905 革命中的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党

对领导权 (leadership) 最周全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其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仅仅依靠列宁的著作，那么这位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运动的杰出实践领袖将不会对理解领导力有何理论助益。因为列宁著作中的主要倾向表明，他提出的先锋党的独特概念只是将革命机构从工人阶级那里重新分配到由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先锋队组织上去。从这个角度解读，列宁的计划无非是确立一个能够用自己的革命意识来替代所谓的工人阶级对革命活动的无力的代理者。但是，以列宁对手的类别来给列宁本身下判断的解读方法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立场。列宁的核心论点，即必须从外部将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引入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现在可以重新表述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斗争的有组织干预，工人阶级运动就不能产生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笔者认为，列宁论题的影响在于重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用来处理领导现象的范畴，并以某种方式对领导与群众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产生某种概念上的把握。

一、先锋队和社会主义意识

如果把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等同于经济基础，把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等同于上层建筑，那么列宁的论点就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首要基础的唯意志论逆转；革命不再基于对阶级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而是有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意志的表达。这些范畴提供了很少的概念空间来把握领导的现象：革命不是由工人阶级完成的，**就是**由先锋党完成的；要么工人

阶级自发地产生了一种革命使命意识，要么自称先锋队的革命知识分子替代了这一自发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只能体现在传授革命圣召的意识上。因此，政治实际上等同于教育，而基本的政治划分取决于教育者是否尊重学习者的自主性。

然而，列宁的论点反对任何对自发性和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划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有意识的先锋队既被要求培育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也被要求与之进行斗争。这一立场明显表面出的矛盾是基于对自发性本身的评估，即它既是社会主义意识的胚胎，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杂质间，列宁尖锐地指出了一个矛盾：“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使工人接受它。”¹只有通过考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何在同工人阶级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其支配地位的辩证过程，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主张。

问题的术语（自发性与意识，资产阶级自发性与社会主义自发性）必须在斗争的动态中确定。需要两种层次的分析。在第一个层次上，抽象概念从意识形态——也就是“意识”——对社会力量自发斗争（这种斗争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特征）的影响中抽象出来。由于在这一层面上，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表现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社会关系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由于这些社会关系，工人们可能会自发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以此解释他们在斗争中的处境和方向。但列宁认为，自发运动不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经济基础。宣称“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六卷，第40页。

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的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不过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父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党人的自觉性。”¹

根据这个“简单的真理”，列宁分析道，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运动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运动，它同时也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和信息的机构载体，如政党、政府机关、报纸和教堂，其运作只是以假设或以其他方式接受资本主义利益的支配）的影响。从这些术语来理解，自发性运动就是在无产阶级潜在先锋队的社会主义意识行动范围之内，但又超出其控制之外的运动。只有在这第二个更具体的分析层面上，列宁才能确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受这种支配的不是工人阶级本身，而是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开展，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运动是从其革命的社会主义先锋队中、从政治活动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自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抽象出来的。

根据这些，没有理由断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无懈可击的，或者工人没有能力进行自发抵抗、政治斗争，或者实际上没有能力去创新。自发斗争的逻辑形成了一种动态，通过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经验部分地相互构成。自发性斗争的局限性不在于工人阶级运动完全没有能力产生任何特定形式的政治活动，而在于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运动没有能力建立与其敌人旗鼓相当的战略独立地位。因此，列宁关于外部意识的论点可以重新表述为以下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五卷，第327页。

三个主张：第一，工人阶级运动如果不认识到其利益同围绕资产阶级利益支配地位而组织起来的整个政治社会体系的不可调和性，就不能坚定其战略独立性；第二，这种认识意味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背景下评价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尝试；因此，第三，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有组织的领导，这种认识就不能有效地影响阶级斗争。列宁没有立即得出在斗争过程中，革命意识必须也对工人自发创造的能力敞开大门的结论。

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政治计划设想为对复杂、不平衡、矛盾的领导权斗争逻辑的决定性干预，需要这一套外部意识的设定。而这正是沙俄的阶级斗争环境要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展侵蚀了专制主义的封建和家长制基础，但资本主义不可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前景使得对沙皇和地主制度的彻底民主改革势在必行。但俄国资产阶级对国家和国际金融的依赖使其不太可能成为坚定的民主革命领导者；早熟的工人阶级运动力量促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进步派地主达成“温和”的政治解决方案。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性。但这并不依靠于两个阶级简单直接的极化，而是有赖于由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组成的革命民主联盟的协调。因此，在民主革命中争夺领导地位和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纲领和其他政治联盟体系的政治方向的斗争。正如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意识必须本能地掌握争夺领导权的复杂和不平衡的过程。在关注有意识的先锋队和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之间的矛盾时，意识来自外部的论断使列宁矛盾地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行动者的自己置于阶级斗争之中。它展现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有意识的先锋队和群众的自发运动都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有时甚至能够采取创造性行

动，尽管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行动方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某种联系，即使是两者的“融合”，也需要在革命变革过程中保持领导权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引入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主张并不意味着一个集体行动者取代另一个集体行动者，而是打开了一个概念空间，在这其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将接受严格的考察。通过考察列宁对苏维埃在 1905 年革命中崛起的反应，我将描绘出这个空间的一些轮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指出，列宁对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和苏维埃的立场只有在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背景下才具有意义，而正是这一逻辑支持了他的外部意识论。列宁立场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一论断，而恰恰取决于这一论断。列宁将对领导的要求同既涉及对手和盟友，又涉及领导者和群众的领导权政治斗争逻辑联系起来，他的战略分析比自己的孟什维克对手所代表的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替代方案更能深刻地理解和有效地把握领导者和领导的动态关系。我将进一步指出，列宁在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斗争中的立场，将比影响甚广的“后马克思主义”“反领导权”（或译“反霸权”）概念更有效地处理革命群众运动的多元性和领导关系的复杂性。

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暴露了沙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紧张局势。加邦神父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取扩大政治言论自由的运动中得到启示，率领圣彼得堡工人进行游行，向沙皇尼古拉本人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当沙皇的军队以枪杀数百名请愿者作为回应时，即使是最落后工人也不会去指望浩荡皇恩了。一场革命斗争开始了，其间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政治罢工、兵变、土地征收、农村的持续动乱以及当局的让

步，随后则迎来了残酷镇压。革命将改变俄国政治的基础，列宁的政治思想也将随之改变。但改变的方式和内容仍然是争议问题。列宁使用了与革命前有所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自发工人阶级运动和自觉先锋党之间的关系。由于强调的重点、语气和表述方式的转变，许多作家或多或少地试图将 1905 年群众民主革命的列宁与革命前《怎么办？》中的党派政治家列宁的做法进行系统的对比。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塞尔·利伯曼，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列宁……反对列宁主义的第一次尝试”。据称，列宁被无产阶级自发性吸引住了，他现在抛弃了从前对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不信任。他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面民主化的呼吁被认为同他早期的“党的精英主义概念”背道而驰。据称，对知识界的职业革命家的依赖会让位于对革命工人涌入党内的热情，以此作为缓解委员会冷漠的官僚主义的一剂猛药。尽管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干涉对地下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但在革命现实的光照下，列宁将自己塑造成了自下而上的创造性提议的代言人。以前关于革命“必须是先锋队而非群众党的工作”的假设，现在将被承认苏维埃是工人群众的广泛的权力组织、是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的想法所取代。因此，1905 年革命是“一场撼动教义的革命”。

列宁在 1905 年的重新表述是理论上的逆转还是仅仅代表了现有分析工具对变化环境的适应？利伯曼的方法将自发性和自觉性、工人和知识分子、民主和集中、党和阶级等从列宁关于革命战略问题的思想中抽象出来，并未能很好地判断这个问题。经过抽象，这些概念不再在列宁从理论上把握的马克思主义设想（以便在政治上转换复杂多变的诸种阶级力量）中占据确定的位置；相反，它们被视为一组本质上的伦理差异，每一组术语都代表着一组对比鲜明的价值观，它们之间反复的重点

转移只会上演一出灵魂在相互冲突的政治道德要求之间撕裂的戏剧。但这些术语也可以根据列宁对政治斗争的战略定向来处理，这种定向是由这样一种认识形成的，即政治力量、运动、建制、政策、问题、思想本身不是对行动者的社会经济阶级地位的简单反映，它自己也对斗争中行动者的行动做出反应，因此总是要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本身的逻辑和发展情况进行重新评估。我用“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一词来描述列宁主义的见解，我认为，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概念，既不可能展示列宁政治思想中的戏剧性转变，也不能解释真正的理论运动。

“毫无疑问”，列宁写道，“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¹只有在一个有能力应对革命进程中的偶然变化，从而提出适当问题的概念框架去把握和理解，才能从革命和群众中学到些新东西。这里表达了同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只是因为他想教革命点什么，他才能从革命中学习到怎样教革命做事。列宁将工人和农民自发革命运动的经验纳入他对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的分析中，从而得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这样，他得以本能地掌握自己的自身处于领导权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得以校正他对自发性和意识关系的描述。他不是通过放弃外部意识论来做到这一点，而是精确地致力于这个逻辑——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

列宁对 1905 年农民运动的反应在这里无法被广泛地考虑，但也许下面的事件可以用来表明，他对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反应只有在结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一卷，第 2 页。

合它的时候才能被充分理解。1905年8月举行的全俄农民联盟成立大会提议向“我们的工人兄弟们致意，他们长期以来在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中流血牺牲。”但是，当一位社会民主党代表介入讨论并声称“没有工厂工人，农民将一事无成”时，他听见下面传来“相反，没有农民，工人将一事无成”的喊声。显然不是一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领导权立马就能行使，即使在有一定程度的善意和承认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和政治估测的复杂性就像是一根细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可以以此为基础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即使俄国党的组织对这些估测作出了可靠的反应，但仍然无法让他们的见解在农村中产生影响。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通过比党更广泛、更根深蒂固的网络来传播。因此，需要重新评价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和苏维埃的崛起。

三、自发性运动和苏维埃

苏维埃制度最光辉的典范——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诞生于10月大罢工的高潮期。首都的工人们熟知在工厂中选举代表的理念。根据1903年的一项法律，管理层可以从工人提名的候选人中选择工厂老人（starosti）来协商他们的不满；自1月罢工以来，许多工厂都成立了代表委员会；在流血星期日之后，工人们参加了两阶段选举，选出失败的希德洛夫斯基委员会（Shidlovsky Commission）的代表。该委员会由政府成立，旨在调查工厂工人骚乱的原因。除了这一实践经验，在夏天，工人们还接触到了孟什维克努力宣传的“工人大会”和“革命自治”口号。

当罢工浪潮席卷圣彼得堡时，一些工厂自发地选出了代表。当孟什

维克发起一个工人委员会来领导大罢工，并试图扩大其代表性，鼓动每500名工人选举一名代表时，它被冠以“革命自治”的名义。工人代表苏维埃因此成为一个罢工委员会，但它已经被更广泛的政治愿景所调动起来了。为了应对总罢工的实际需要，苏维埃开始像“第二个政府”一样行事，对日常生活事务进行统治，并向邮局、铁路部门甚至警察传达指示。罢工运动的势头如此之大，以至于沙皇感到有必要让温和反对派进入秩序阵营，安抚局势，承认公民自由，建立拥有立法权的代表大会、部长负责制和进行普选。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并未被破坏。苏维埃不断扩散到俄国的各个城市中。在处理群众关心的日常问题时，他们赢得了广大工人阶层的忠诚，并在城市的非无产阶级人口中赢得了同情和支持。他们重新发起了反对国家镇压和戒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人民政府”的罢工活动，并且越来越侵犯国家的特权。按照同沙皇国家非法对抗的逻辑，他们开始扮演起作为起义机构和革命国家权力机关的新角色。在独裁政府能够恢复秩序并部署力量打击农村的农民起义之前，它必须镇压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起义。

到11月初列宁从流亡中归来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孟什维克和更不愿合作的布尔什维克）就苏维埃重要性进行的辩论已经定调了。孟什维克呼吁作为新制度组成部分的“革命自治”和“工人大会”。通过先前孟什维克对组织苏维埃的影响，他们成功进入了苏维埃本身的概念中。一个革命自治的方案呼吁工人组织在杜马进行正式选举的同时主动组织向群众开放的选举进程。这将给官方选民带来舆论压力，并且一旦吉时已到，人民的代表就可以宣布自己为制宪会议。无论它是否达到这个“理想目标”，这样的运动都将“会产生革命自治组织，这种组织将能

摧毁沙皇的法律限制并为革命的未来胜利奠定基础”。¹像孟什维克理论家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那种工人大会的概念就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活动。大会将由工人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以“通过有关工人阶级当前要求和行动计划的具体决定”。它将讨论对“政府对代表会议的讥讽”所采取的立场、同自由民主制机构达成协议的条件、召集制宪会议以及在该机构选举中所提倡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其他此类当前公共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围绕这一理念的鼓动可能“吸引数万工人”，这一群体在革命时期足以“赋予大会及其决定和由其建立的组织以巨大的权威，无论是在意识不足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还是在自由民主派眼中都是这样。”即使大会没有取得成果，通过促进“工人群众的政治启蒙，增强他们的战斗精神，培养他们以武力满足其正当要求的能力和准备”，这种鼓动也可能引发起义。孟什维克希望通过为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提供一个论坛，这样的提议可能最终形成一个群众工人党。因此，苏维埃制度最根本的利害关系是工人阶级与其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民主革命中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议程。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无法以与孟什维克不同的方式理解新的制度形式，因此做出了防御姿态。他们担心一个无定形的非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影响会破坏工人向社会民主主义靠近的政治演变，因此对苏维埃的组成充满怀疑。他们的领导人波格丹诺夫赞成向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和领导，否则布尔什维克将退出。最后的结局是，他们留在苏维埃内，以期纠正自发的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并阐明党的思想。也许是考虑到列宁早些时候关于无党派政治组织充当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渠道的危险的警告，他们试图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一卷，200-201页。

将苏维埃作为“特定无产阶级行动的执行机构”的需要同“妄图成为工人阶级政治领袖”的需要区分开来。但是，当列宁回国时，苏维埃已经达成了它为之形成的“特定无产阶级的行动”，并且没有表明退出政治行动领域的迹象。

四、列宁的干预

从孟什维克和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争论来看，列宁的干预必然显得反复无常、前后矛盾。我认为正是这一现象导致了关于所谓列宁“反对列宁主义”的说辞。我要说的与之恰恰相反，列宁将苏维埃置于领导权斗争的战略逻辑背景下就足以将其视为行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工具，从而改变论辩的表达方式。一旦认识到这一转变，所谓列宁“反对列宁主义”的论据就不攻自破了。一旦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就可以确定他思想中的真正运动。列宁在长篇文章《我们的任务和苏维埃工人代表》中谨慎地推进了对形势的解读，该文章本应刊登于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报》上，但实际上最终未能刊登。苏维埃自从作为罢工委员会就自发地成为革命政治的中心，能够团结“所有真正的革命力量”并充当反抗国家起义的工具。因此它应该被视为“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从这个角度考虑，苏维埃广泛的、超党派的组成并不是劣势。相反，“我们经常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实行战斗联合。我们说过这一点，而工人们[在造就苏维埃的过程中]则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出色。”关于领导这场政治斗争应该是苏维埃还是党的问题本身是不周全的：党和经过改组的苏维埃都是必要的。事实上，“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治领导中心，不是一个太广泛的组织，倒是一个太狭隘的组织。”它必须组建

成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应当“不只是从工人中吸收新的代表，而应当首先从各地起来争自由的水兵和士兵中，其次从革命的农民中，再其次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吸收新的代表。”¹

对苏维埃的这一评估伴随着一项要求，即根据政治自由的新条件（尽管不稳定）重组布尔什维克党。尽管党的秘密机关必须得到保护，但党必须向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敞开大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致力于创造新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比旧圈子更广泛、更灵活、更容易被“典型的群众代表”所接受。因此，党必须采取民主措施，其中包括选举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普通代表。入党的工人应是可靠的社会主义者或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人。“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²工人比知识分子更善于将原则付诸实践，他们应当处理好党的团结问题。

在列宁的分析中，苏维埃不仅是总罢工的组织者，而且是一个非党派政治组织。然而，在做出这次评估的几天里，他宣布“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³，以此来支持布尔什维克对“非党的”阶级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宣称“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议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根本不是一个自治机关，而是有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⁴他宣布为了为运动提供政治领导，苏维埃是必要的，并且表明党需要通过“典型的群众代表”的涌入来充盈自

¹ 本段引文皆来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57—59页。

²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80页。

³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109页。

⁴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120页。

身。但与此同时，他也发出警告，在党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工人们迫切要求建立组织的心情，将会采取不正常的、危险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承认，如果党有蛊惑人心的倾向，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突然涌入的未经考验的新成员可能会使党淹没在群众之中，而不成其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进部队。¹尽管工人“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但仍需考虑“无产阶级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抗拒”，而它提出以无党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无产者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日益加强，也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而这种“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在介入自发性斗争时所设想的。²

如果从领导权逻辑出发去抽象地考察，列宁对苏维埃和自发性工人阶级运动的反应似乎陷入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表述之中。然后，他的论述可以分为反映自发阶级斗争现实的内容和标志布尔什维克机关进行抵制的内容。孟什维克史学家所罗门·施瓦茨最为系统地运用了这几个步骤，将列宁的论述简化为夺取政治力量的战场，而这也隐含在利伯曼的关于列宁违逆列宁主义教义的解释中。然而，一旦将列宁对苏维埃的立场置入领导权斗争的背景下，这就显得多余了。

五、苏维埃和领导权斗争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在大罢工胜利后立即表现出的本能的、自发的社会民主倾向并不在于追求具体的社会主义目标。在一篇流传甚广的解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 79 页。

²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 108 页。

释非党意识形态和建制的文章中，他将“工人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并[即使]在运动的最早阶段……与社会主义政党结盟”当作“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的特征表现。然而他同时声称，对来自俄国各地工厂、办公室、团队、教区等的要求、委托和申诉的考察将表明它们大多数都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而不是“特殊的阶级要求”：

“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¹如果说工人阶级运动是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么这不是因为它的意识，而是因为它的实践，不是因为它的思想，而是因为它的作为和它作为的方式。为了理解这一点，自发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必须与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相联系，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条可能道路之间的斗争相联系：地主-资产阶级道路和无产阶级-农民道路。首先，大罢工使拟议中的杜马无法运作，从而破坏了它所代表的沙皇和资产阶级之间所作的妥协。凭借着自己的战斗精神、坚忍不拔和“大众化”的方法，工人的革命斗争自发地摆脱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战略领导权，尽管它还没有自觉地、因而也没有持久地进行斗争。在“城市的革命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有责任“扩大和加深革命的基础，把革命扩展到农村去……革命战争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主要的后备力量是从敌人昨天的同盟者即沙皇制度昨天的拥护者的阵营中，或者从那些曾经盲目跟随沙皇制度的人的阵营中得来的。而全俄政治罢工的胜利比任何宣言和法令中的含混不清的言词更能打动农民的心，更能启发他们的觉悟。”²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125页。

²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31-32页。

总罢工的自发运动不仅开辟了决定性革命变革的可能性，而且通过生产和（或）对既成事实的要求，从物质上体现了领导权的行使，而不仅仅是通过意识和信仰的产生和传播，从思想上体现它。它预示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社会和政治力量联盟体系的重组，既破坏了对手力量的稳定，又动员了一个初步的革命联盟。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其自发斗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走向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战略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在大罢工过程中被抛上舞台的苏维埃提供了一种制度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大规模地形成革命民主同盟。由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独立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自己与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特别是农民联合起来，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基础，因此苏维埃构造了可以被放置在革命道路上的“无产阶级独立的印记”的形式。虽然苏维埃产生于工人阶级运动，但列宁并没有将它视为一个特殊的无产阶级机关和一种工人独有的组织形式。事实上，在他的分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作为一种组织模式的苏维埃向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水手和士兵等等大众开放，这是一个可以形成革命民主联盟的政治领域。正因为如此，它才意味着革命民主国家政权的萌芽。这个对苏维埃的评价是在为 1906 年 4 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决议中明确提出的，并在一个分送大会各代表的长篇小册子《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作了更全面的阐述。根据该决议，苏维埃“是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广大工人群众的非党组织”，不可避免“将有小资产阶级最革命的分子参加……变成整个革命斗争的

机关。”¹然而，在这场运动的背景下，“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新形式的革命权威：

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²

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和类似机关的权威既不是来自刺刀或来自金钱的力量，也不是来自顺从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关的惯习，而是从“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全体群众”参加政权的实践出发。新政权并不以繁琐程序、秘密和专业技能来遮盖其运作：“新政权……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考虑到群众也包括那些在威压下畏缩、堕入意识形态、习俗或偏见、或只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苏维埃的革命政权不是由全体人民行使的，而是由“革命的人民”行使的。但后者耐心地解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并且“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³因此，与其说新政权构成了一个萌芽中的国家，不如说它是反国家的萌芽。这一意蕴尚未被拉上台面，但社会与政治机器、人民与国家权力组织之间的对立确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瓦解。苏维埃提供了一种制度形式，它使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207页。

²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286页。

³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十二卷，第287—290页。

群众、工人和农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斗争与革命政权的斗争相结合，并且相互放大和加强。

六、自治还是革命领导权？

如果理解得当的话，列宁对“革命自治”、“工人大会”和非党原则的批评不仅与他对1905-1906苏维埃的分析不矛盾，而且恰恰符合其逻辑。援引“革命自治”这一主题来描述苏维埃的特征，就是援引那些使其流行起来的孟什维克的政治倾向。在列宁看来，他们只是将“革命自治”的行使同沙皇政府中装模作样的合作并列起来，而没有对无可避免的反革命镇压进行战略性的预先思考。因此，从领导权斗争的逻辑抽象地设想，“自治”代表着否认组织革命暴动的必要性，或者至少是拒绝主动组织革命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意味着要求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而是将其置于政治教育的实验之下。这就是列宁批判的对象。

“劳工议会”和“工人大会”等提法更是如此，它们在将苏维埃认定为工人阶级的无党派组织方面具有额外的劣势。在这样的框架下，苏维埃将排斥非无产阶级群众，贬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而在列宁的分析中，苏维埃无党派结构之所以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形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联盟。非党性确实是资产阶级原则，但由于革命进程要求工人与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结成联盟，所以缺点转化成了优势。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尽管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这种领导正是在围绕着一个革命起义组织来开展一个阶级联盟的过程中发挥的，所以在解决“工人代表大会”等概念所代表的战略混乱方面发挥了作用。

正如苏维埃的崛起所表明的，工人阶级斗争自发的社会民主倾向不仅仅是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政治教育。工人们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建议付诸实践；他们还表现出了政治创新的能力，并在实践中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议程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所作所为的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正是列宁将他们的创新置于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的框架下，为他们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工人阶级到底做了什么？它不仅暂时打破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权，为自己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而且还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各种革命民主力量可以在群众、工农联盟中相互融合，并取得国家政权。因此，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显示了自己的领导力。

苏维埃组织形式的这种领导潜力只有通过符合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的行动才能持久地实现。因此，这就需要部署武装力量来应对和击败反革命的暴力活动，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来抓住政治斗争中不断变化的关键时刻和阻绝意识形态混乱的根源。苏维埃并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干预变得多此一举，但它和类似形式的组织也已经体现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斗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苏维埃颠覆了赋予政治以其形式和结构的惯例，它重新组织了政治生活的空间：将政治决策过程向广大群众开放，鼓励大众进入政治；在对专制政权的进攻中，他们将人民的社会、经济、文化诉求和不满融合在一起，明显地扩大了政治斗争的范围；他们摒弃了各种阻碍参与这场斗争的形式，促进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民众力量的融合。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沿着使马克思主义先锋党能够更有效地推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治计划的路线，重组了政治斗争的版图。这样，在改变斗争局面的过程中，苏维埃制度代表了作为党的计划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念同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道路上的物质铭刻之间的联系。列宁在这一背景下对苏维埃进行的理论化，使其能够把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连贯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串联起来。

几年后，为了定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概念，他将求助于一个空间隐喻，尽管并没有具体提到苏维埃：

谁要在由自由派规定的或经他们允许的范围、形式和外貌的舞台上给阶级划出一个“独立的”“活动”角落，谁就是不懂得阶级的任务。只有那些集中注意力（包括意识和实际工作等）去进行对这个舞台本身、它的整个形式和整个外貌的改造而不受自由派标准的限制的人，才能懂得阶级的任务。……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前者排除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后者特意确定的正是这个思想。¹

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正是建立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它要求人们做好武装冲突的准备，随时准备运用起义的艺术。它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科学和鼓动的艺术展开了一场思想之战。但它也由战场的形状、轮廓和规模所制约。这场斗争可能是按组织的艺术有意识地进行的，但它往往是自发地展开的，是对既定惯例的突然颠覆或挑战的产物，其影响因公众参与的力量而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得到加强或改变。部署在政治的客观物质环境中的那个约束政治行动者对彼此预期的惯例，塑造了一个政治行动的舞台，尽管政治行动可能会受到与其相关者的影响，但这既提供了各种行动的可能性，也对行动者的计划施加了某种结构性约束；个体行动者偶然遭遇这个舞台，就像棒球运动员必须适应一个奇异的体育场一样，这不完全是通过说服和胁迫，而也有境况的力量。因

¹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第 122 页。

此，领导权的行使不仅可以让它自己感受到因被说服而同意或因被胁迫而害怕的情况，还可以感受到对境况的适应。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孕育苏维埃的过程中改变的政治活动环境，使曾经的限制发生了各种松紧变化，使各种可能性离现实的距离也发生了变化，使一些胁迫更有力，一些说服更可信，而其他的则反过来；重建政治舞台，不仅使工人本身，而且也使农民、士兵、水手、雇员、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地主和资产阶级）能够和（或）要求行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根据工人阶级为领导权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

七、领导权的实践和理论

列宁运用领导权斗争的政治战略逻辑来分析农民和工人自发的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计划有了更具体的方向。在革命之前，他将领导权的行使比作人民的讲坛，其职能是表达全体群众对政权的任何不满；这种普遍作用得以保留，但农民革命运动的出现要求领导权采取工农联盟的具体形式。在早些时候，领导权被认为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广泛影响，在实践中容易与进行党的宣传鼓动相混淆；但是，随着苏维埃这种制度形式的出现，它能够建立工农联盟并行使革命国家的权力，领导权可以被具体设想为包含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列宁政治分析中的战略逻辑要求接受阶级斗争中同时发生的变化。这使他的理论立场具有一定的自反性，使他能够用自发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来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在另一个意义上，构成孟什维克领导权概念的基础的无产阶级自我活动的理念是可兼容的。根据阶级斗争局势的变化，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不同的表现。然而，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由于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从来没有同争夺领导权的战略逻辑相联系，其特征在于它在自己

的意图中预示着社会主义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与现实没有距离也就意味着没有理论空白，理论就没有成长的可能。适合特定情况的自我活动形式必须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自发发展。对无产阶级自我活动的呼吁将被放置到一个因革命失败而强加的斗争舞台上，孟什维克不会挑战这个舞台的边界，而是会把党的非法机构当成破铜烂铁扔在一旁。长期以来，孟什维主义在列宁的战略版图上一直被视为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中介，他声称，这等于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计划。孟什维克将越来越多地放弃领导权的语言。但他们从未拥有——因此就无从放弃——列宁开始使用的领导权概念。

从列宁的观点来看，孟什维克关于领导权的论述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从属并嵌入资产阶级领导权部署中的另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孟什维克对作为工人自治机构的苏维埃的分析，与当代“后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权和反领导权的讨论难以置信地达成了一致。在这里，孟什维克的自治不是一场推翻国家专制权力的斗争，而是一个工人可以在政治上进行自我教育、使这个温室不受国家权力影响的论坛，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反领导权意味着，这不是一个沿着新路线、在新领导下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计划，而是对任何领导权计划的批评，认为领导权是一种狂悖的主张，旨在阻止个体自我定义过程的创新多元性，从而“缝合”社会秩序。事实上，列宁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的术语“无产阶级领导权”被“反领导权”所替代，这表明资产阶级统治被一个全无社会秩序，而由自我定义的自治个体所构成的世界所替代。然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讽刺地宣称，资产阶级有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

自然的创造力”¹，这表明，正如一个人不能简单地生产自己一样，他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定义自己。一个人总是发现自己早已置身于环境中，所以他总是已经被定义，即使他理解和（或）被理解自己的术语是有争议的。在阶级社会中，用于改变环境和重新定义政治计划、抱负和身份的艰巨工作的材料是由阶级斗争的历史运动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不仅仅是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努力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静态背景：正如工人在斗争中自发地革新一样，统治阶级也通过其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进行革新，以应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制定社会主义计划的过程和阐述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自我定义的过程，是一个其对手不可避免地积极参与的过程。不考虑这种存在，就是按照给定的政治舞台轮廓，从而在反领导权斗争中采取从属的立场。严格来说，这是为了让政治领导变得不可想象。

相比之下，列宁一直拒绝将政治与教育等同起来，这为分析领导关系的细微差别开辟了一个概念领域。领导的一部分是对被领导者的政治教育，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先锋队和群众在阶级斗争中扮演着不同的、可能互补但有时本质上相互矛盾的角色。群众在运动中的组织数量和分量，可能会导致不可预见的政治力量、可能性和立场的出现。而根据对敌人进行的战略估算，今天可以确定下来的阵地在明天就会被投入和转换。因此，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求人们有能力适应政治斗争不断变化的局面，并将对形成斗争逻辑的潜在力量的认识同对不同行动者、先锋队和群众、敌人和同盟在斗争中的革新的开放态度结合起来。因此，领导阶级斗争需要一个有意识的先锋队，它能嗅到群众斗争的风吹草动，但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 版，第三卷，第 357 页。

在必要时也愿意用自己的政治分析同群众的自发运动相抗衡。有人可能会反对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这种对立只是为少数人暴政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理由。但是，只有当列宁领导方式中的概念和区别不能提供对阶级斗争逻辑的卓越分析时，这种反对才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的真实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列宁的分析确实阐明了群众运动的逻辑和动力，那么真正的问题则是葛兰西提出的：“在领导者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根本前提：这是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永恒存续，还是为了创造不再需要这种对立的条件？”

阿兰·桑德罗 著
阿列克谢 译

先锋队理论中的卢森堡和列宁

在 1904 年的时候，罗莎 · 卢森堡发表了一篇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的文章，在其中首次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从这时一直到 1918 年的《论俄国革命》，贯穿在卢森堡和列宁之间的似乎不是什么同志情谊，而是不断的批评与反批评。在“极端的年代”尚未结束时，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仅仅被当作一个地方性的、具有一定特长的革命家，而不是一个在理论上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的导师型人物。然而当苏联轰然倒塌，卢森堡的出生地和殉难地在形式上重新连接在一起时，她却被许多人推崇为另一种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了。用卢森堡的著作来批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头，在今天，她居然成为了列宁不可调停的对手和社会主义出路的先知。那些利用红色罗莎作为反列宁主义白手套的人要么早早就脱离马克思主义，成为华尔街文明的急先锋，要么就是既不愿受列宁主义束缚，又不想干脆丢掉左翼的名头，于是就把卢森堡（和其他许多人随意放在一起）当作左翼沙龙活动的主保圣人，似乎只要把卢森堡和诸如阿伦特、福柯、德勒兹等人摆自己的案头，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就会自然而然地以去中心化的形式打败陈旧的集中制先锋队。更有甚者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引爆的革命称之为建立“多元平台专政”的过程，要把十月革命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作去中心化的事件来叙述。对列宁主义的这种歪曲无非只是重复《国家与革命》著名的第一段内容，而在把目光转向列宁之前，他们也对卢森堡做了同样的事情。

无论是歪曲列宁的吉比雪夫、莫洛托夫还是马尔库塞、阿多诺之流，无论是把卢森堡归为更自由意志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麦克莱伦或各种“卢森堡主义者”，简单地批判先锋队制度必然（因为其根本性质还是技术上操作不当）走向官僚制、威权主义的观点从来不符合历史，而这正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腐化问题”时陷入的最严重的错误，因而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列宁和卢森堡的原因。

整体来说，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三类：组织问题的分歧、民族问题的分歧和农民问题的分歧。这三方面不是分别从某一个文本中提取出来的孤立问题，而是交织在整个俄国-波兰-德国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的，它们既是思想纷争，又是实践所要求的。在刚刚提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卢森堡批评列宁让“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因此在她看来，列宁的组织形式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完全布朗基式的密谋组织，党的机体实际上失去了自主性，仅仅是列宁为首的领导层的提线木偶而已。因此，在卢森堡逝世后，收录这篇文章的小册子曾用《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标题出版，奠定了卢森堡作为反中心化先锋队的自发性斗士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卢森堡支持某种分权的组织形式，她仍然认为革命取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革命前的时期在多大程度上知道如何让群众感受到它的影响，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由政治上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工人活动家组成的坚实的中央核心，以及它的所有教育和组织工作的总和。”很明显，卢森堡完全没有否认集中制的必要性，她甚至坚持认为“毫无疑问，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来说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和那些声称卢森堡反灌输论的论调也截然相反，她说：

在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组织问题同先前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试验不同，它也不是宣传工作的人为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产物，而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把政治觉悟灌输到其中而已。¹

事实上，卢森堡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反驳列宁，因为**他们都是第二国际的孩子**。就像列宁在《怎么办？》里寻求考茨基文本的帮助一样，卢森堡作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德国党的理论家，同样也深受第二国际本身的影响。例如，第二国际始终秉持“一国一党”的理念，即一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这些政党内部就行使集中制（后来改叫民主集中制）。正是因此，列宁作为挑起俄国党矛盾的“分裂者”才显得如此刺眼——**他虽然依赖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就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但其政治活动本身就是对第二国际公理的挑战**。然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第二国际的预设——列宁本人也不能幸免——这正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常常支持孟什维克。就像托洛茨基本人回忆的那样，1903-1904年的争论原本是模糊不清的，许多人都被它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而，即使是在1905年孟什维克早已展现出自己向**自由资产阶级投降**的面目时，卢森堡仍然认为“为了成功地演出它担任的角色，俄国社会民主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党的**统一**。”²也正是部分出于对统一的坚信（另一部分是民族问题的分歧），在1912年布尔什维克正式驱逐孟什维克，在形式上成为独立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派别）时，卢森堡同列宁的关系降至冰点。

¹ 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² 卢森堡，《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因此，卢森堡和列宁的关系只能放置在第二国际的整个谱系中才能充分得到讨论，夹杂在批评中不易被我们窥见的恰恰是卢森堡和列宁在第二国际谱系中的家族亲缘性。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把卢森堡当作自发性旗帜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可能理解列宁，也无法深入卢森堡的思想。卢森堡并不在先锋队、集中制等方面反对列宁，在她看来，列宁的问题是把集中制推向了一个极端：

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例如中央委员按照这个观点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也有权确定从日内瓦到列日，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俄国每个地方组织的人员组成，给它们提供准备好了的规章制度，通过一纸命令就可以完全解散它们并重新加以建立，最后还运用这种方式间接影响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可见，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¹

先抛开俄国党的组织技术不谈，卢森堡在后文表露出对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保守化倾向的担忧确实是真实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它凭经验把每次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战爆发时几乎全体倒戈，导致德国工人运动陷入混乱状态，而这正是部分由于党长期活在

¹ 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议会斗争的温柔乡里，结果反而被德皇整合进既有秩序了。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以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首的本土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最初反对列宁对第二次革命的呼吁，实际上是为临时政府作保。

卢森堡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她认为列宁加强了中央委员会的职能，而这将会使地方上的委员会失去自己的能动性，无法再从群众自发运动中汲取革命的新经验。批评在这里似乎一切正常，但她又说：

“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在这里，第二国际式的铁的必然性压倒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体辩证法，而这正是卢森堡和列宁的区别。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到“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恢复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神髓。在 1917 年的革命史上，他通过动员基层党员和中层干部，并且联合与自己立场已然接近的孟什维克（例如科伦泰）和调和主义者（例如托洛茨基和后来的区联派），最终扭转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反对革命的局面。一些人认为列宁力挽狂澜的秘密在于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克里斯马权威，这毫无疑问陷入了英雄救世的老调叙事中：失去了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和普通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关键不是列宁自身的领袖魅力，而是布尔什维克一部分领导人仍然同群众（在这里也包含基层党员）处于有机联系中，通过和群众联合行动把党从以往斗争经验带来的理论惰性中拔出来，使党的全部机体重新成为革命和群众的先锋队。就像瞿秋白说的那样：列宁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无产阶级掌握的知识分子工具。这样的工具在彼得堡名为列宁，在莫斯科就是以布哈林等人为首的青年一代布尔什维克，在乌拉尔地区是克列斯廷斯基。

早在俄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几年里列宁就多次谈论过党的斗争模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不是通过繁琐的民主章程处理重大事务，“我们解决严重的冲突和意见分歧，实际上根本不是‘按照章程’投票，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¹这种不成文的斗争方式恰恰形成了俄国党内部非正式的组织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反对建立一套庞杂却实质上会被绕过的党内民主制度，在《怎么办？》中，列宁用一个几乎不带理论含义的“同志情谊”概括了这种机制。很少有局外人（如考茨基、卢森堡等等）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俄国党内部，托洛茨基等远离党务工作的理论家同样无法理解这一点，甚至列宁本人也没有专著谈论这一问题，并且在早年间认为这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特的形式而已，只是到了30年代，狱中的葛兰西才把这一实践问题转化为了理论。

与这个有机关系关联起来的除了党内同志的关系，还有苏维埃这一革命的形式问题。不同于波格丹诺夫等要求苏维埃立即接受布尔什维克管辖的人，列宁认为“为了领导政治斗争无疑既需要苏维埃（改变了方向的苏维埃，关于这个方向立刻就要谈到），又需要党。”²正如《列宁和领导权》一文指出的那样，列宁希望通过苏维埃建立一个以布尔什维克为领导的下层阶级反资本主义联盟，而这正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深入地干涉其他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把他们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的。

作为波兰党的领导人，卢森堡虽然没有从一开始就在沙俄境内活动，但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仍然吸取了1905年革命的经

¹ 列宁，《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² 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

验。她希望把群众罢工的形式引入德国，而这遭到了考茨基等人的强烈反对。然而问题在于，卢森堡并没有把苏维埃视为一个值得提取出来的重点。在 1905 年，波兰社会党左翼提出了要建立苏维埃的要求，但卢森堡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却拒绝了这一提议，而是做出和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类似的选择，要求工人阶级只团结在波兰社民党周围，忠诚于一党一纲。另一方面，以卢森堡为首的一部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将农民视为革命的同盟（因此就更没有必要组织苏维埃了），而是把他们当作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这使得波兰人民党趁虚而入，收获了大量农民的支持。

除此之外，波兰社民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分歧还在于民族自决。1905 年革命中，波兰社会党左派同右派分裂，寻求与社民党的联盟。但卢森堡坚持要社会党左翼解散自己的组织，然后承认追求波兰独立想法的错误才能吸纳他们，这在波兰社民党内部也引起了相当的失望情绪。1912 年，约吉希斯甚至在卢森堡的支持下将许多反对他的党员开除出党，日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中山大学的校长卡尔·拉狄克也在那段时间内被开除出党。他在回忆时说：“由于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温什里赫特和我因背后有华沙党组织而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党。一方面是以加涅茨基、温什里赫特、马列茨基、多姆勃斯基和我为首的在波兰的党内反对派，另一方面是以瓦尔斯基、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总委员会，这两方面的斗争不具有原则的性质，而只涉及组织问题；这一斗争是革命时期得到

发展的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对国外中心的一次反抗，这个中心不了解工人的更大的自主性是革命的成果之一。”¹

列宁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众所周知，但在面对异议时，前者的手法要灵活得多。虽然列宁坚决支持民族自决，但他并不用组织手段强迫其他民族的同志接受自己的意见。在波兰党和俄国党的多次合作中，列宁都没有主动批评卢森堡及其支持者，只是到了波兰党把态势扩大到党内生活的其他领域时，他才发起第一轮正面进攻。

无论是对一国一党的坚持，还是对农民和民族自决的态度，这些都不是卢森堡的原创，她只是继承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传统。²这些传统可以上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的时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拉萨尔派，但拉萨尔主义仍然深深地嵌入进了整个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直到 20 世纪初弗朗茨·梅林“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科学版本作准备工作”而准备整理马恩遗著时，他编辑的书名仍然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不仅如此，卢森堡本人还在同克拉拉·蔡特金的信件来往中说：

我很高兴你如此欣赏费迪南[·拉萨尔]的思想。我也为之疯狂。我不会让任何人或任何事破坏这一点。他对我影响很大并促使我认真研究劳动与科学。他的理论以其特有的独创性和生动性存在着。的确，在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马克思领先，而在丰富性和生动性上，则前者更胜一筹。³

¹ 郑异凡编，《谁发动了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² 关于民族自决和农民，见《呼声》第一期中的《19 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

³ 彼得·胡迪斯，《作为革命理论家的罗莎·卢森堡：在 1905 年俄国革命前后》。

即使是第二国际左派的卢森堡也深受拉萨尔影响，那些中派和右派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拉萨尔的态度都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他们公开同拉萨尔合作，哪怕在谈论他的戏剧作品《弗兰茨·冯·济金根》时也措辞谨慎和不吝赞美，但在私下却经常讽刺、挖苦他，积攒了大量理论、实践甚至生活上的不满。这是因为拉萨尔确实掌握了一种力量——物质的力量，这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群众性政党。任何一种哲学和理论想要改造世界，首先都要把握群众，让自己成为物质力量。拉萨尔的理论力量远远不及马克思，但他却在把握群众这方面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甚至他死后将近十年才举行的哥达大会上，爱森纳赫派仍然对拉萨尔派进行了妥协，拉萨尔的幽灵从这时开始就侵略进了马克思主义内部。

拉萨尔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国家主义态度。他认为国家是“通过人们的联合，使人们达到他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生存阶段，能够获得他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获得的那样多的力量和自由”的伟大事物。因此，国家就不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写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压迫者，而是一个可以被利用来“做好事”的工具。拉萨尔进一步把社会分为四个等级：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工人。他认为随着绝对精神的发展，之前的三个等级都在不同阶段掌握了国家，或者为自己的利益改造了国家；而在十九世纪这个“科学与工人”的时代，工人等级将在拉萨尔的领导下通过议会和俾斯麦进行博弈，最终成为统治阶级。

这种强调国家地位的论调让人想起斯大林对加强国家机器的理论论证和考茨基对无产阶级必须容忍官僚存在的强调。甚至连卢森堡也不希望保留资产阶级议会，在其中填充无产阶级的内容吗？列斐伏尔指出：

由此可见，在拉萨尔主义中表现出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也就构成了拉萨尔主义。这两个观点是国家的历史连续性观点和统治观点，而正是这两个观点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连续性的观点包含了对各种国家制度（以及它们的必然结果：各种政治结构）赖以建立起来的各种过程的全部或局部的接受。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各种纲领或者革命计划的意义。至于统治的观点，它包含了对各种完整的过程的发现和运用，而通过这些过程，能够实现这种统治的政治力量将在它的周围建立起或重新建立起一种社会的或民族的统一体。¹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²风靡于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拉萨尔主义从一百多年前就遮蔽了国家问题，并且在随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随处可见其影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论的精神，将拉萨尔主义彻底驱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域，然而在他死后，苏联在短暂的时间内又回到了“正常国家”的旧道路上。例如，“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联共（布）中央机关》的决议，决定按职能特点划分党内机构。原来的中央组织分配部分为两个部：组织指导部与行政管理和工会干部分配部。后者负责编制国家机关和社会机关待任命的官员花名册以及任命这些部门的官员。该部下设重工业局、轻工业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财经计划贸易局、财务局、苏维埃机构局和国外干部局，具体掌控干部

¹ 列斐伏尔，《论国家》。

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012版，第138—139页。

任免大权。1934 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决定改组党中央所属各部，‘取消现有的职能部，设立完整的负责生产业务的部’。‘在联共（布）专业委员会下设立：(1) 农业部；(2) 工业部；(3) 运输部；(4) 计划财政贸易部；(5) 政治行政部；(6) 党的领导机关部；(7) 文化和列宁主义宣传部；(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¹也就是说，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将党本身当作与国家机器配套的机构来使用，而这和将党的建设为“国中之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恰好互为镜像——一边是革命前的拉萨尔党，一边则是革命后蜕化出来的拉萨尔党。

即使在今天，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阅读《国家与革命》后仍选择强调列宁的“纯理论”或“理想”意义，以便给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寻找合理性和自洽性。然而，越是贬抑《国家与革命》的实践意义，就越是不懂得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的区别，因此就是完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使这些人在口头上往往显得自己“又红又专”。重新走向列宁，重新考量那些被掩埋在历史尘灰中的列宁主义要素，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而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活动的理论起点。

阿列克谢

¹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分册，第 388 页。
转引自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呼声》编辑部关于组织问题的谈话

杨湛：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和你同一个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我现在就已经打好基础了，会少走一些弯路。

杜临：我是 2019 年接触左翼群体的，那时比较纯粹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既不追捧哲人王，也不向其他派别进行任何妥协）仍然占支配地位，后来成为学院派狂热崇拜者的人还尚存些革命词句——起码嘴上挂着的不是去中心、去阶级的“激进政治”。那时左派之间互相斗争、贴大字报是常有的事。

杨湛：我最初加入过 R 团体，他们那里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只要有异议就会被他们头目豢养的私臣批斗，交流时感觉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聊天室，更像是监狱一样。

杜临：其实在这种团体内，或者说，在所有对统一意识提出要求的团体里，这种批评不同倾向的情况都会存在，问题在于怎么看待不同倾向。许多人的方法是简单地宣称自身是唯一革命的，把不同意自己的都贬为反动派或者即将走过去的反动派。不过也有反例，例如我的某位“老朋友”就热衷于围绕着自己的社交圈搭建松散的左翼大帐篷，只要不触及自己底线——在他那里，底线的意思就是不直接攻击他。这个底线也表现出某种思想性，因为反对他思想的人当然会有很大一部分也连

带着攻击他自身，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只要是属于他社交关系的人，无论思想是不是一致都可以成为大帐篷的一份子。

其实对不同倾向的态度问题列宁早已给出了答案。首先理所当然要宣称自己的革命性，如果连这一点都扭扭捏捏，那根本谈不上任何革命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当列宁面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时，他并没有直接拒绝这些人，而是只要认同自己的政纲，就把他们被吸收进来。不过不是吸收进党，而是在苏维埃内进行合作。例如，安那其主义者或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非常厌恶先锋队的说法，但不管他们支不支持这个提法，只要他们坚持革命者一定要作为组织去影响无产阶级，指引他们进行革命，那么这些人就仍然是可以争取的。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国家的安那其主义者或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完全走向了反革命的一边，而且更悲惨的事实是，现在根本没有几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

杨湛：的确，现在几乎连纲领都没有……。不过说到政治团体，像恩格斯那样用自己的资本筹集革命资金真的可行吗？

杜临：恩格斯大概并没有这样做过。不谈史实问题，革命活动的财政问题其实同时也是组织内的权力结构问题。如果资金不是来自相对平均的成员缴费、匿名性的自愿捐款和团体活动的收入，那组织机体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比如在 20 年代早期，一旦共产国际不予资助，中国方面成员活动经费就会出现困难，整个政党的活动基本就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下属支部不仅情愿听从国际指示，而且是不得不听从了。换句话说，一种强烈依赖少数个人方能运作的组织模式本身是不健康的，即使它在团体初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可以像

这样来看待任何团体内被少数人垄断的技术工作或者别的具有专业性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必须改变组织活动的“手工业方式”，要把成员培养为一个个“小轮子和小螺丝钉”。更直接地说，就是要让组织活动福特化，逐渐向“标准化生产”过渡。

正是因为这种组织特征，列宁被青年托洛茨基以及不计其数的人批判为反民主的密谋家、民意党的复活、布朗基主义的俄国版本乃至官僚集团的始作俑者。其实根本问题许多人不信任这样的组织方式，他们认为这样把组织成员变成“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个关节，实际上是不让他们广泛地参与党内生活，不利于普通成员取得自觉的政治意识，所以会被野心家利用。其实这就是一个基层成员同领导层的关系问题，以及专业化组织的民主问题。诚然，列宁在著作和书信中率直否定民主的做法确实让他看起来像个独裁者，但在这样的秘密组织中，是不是民主、是不是太集权这样的问题提法是不正确的。再分权的架构也无法永远让真理处于多数，最民主的制度也不能保障领导者的政策一直符合自己所代表的人群。最重要的永远都是领导与基层的有机关系。就像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同无产阶级结成有机关系一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层也必须同自己的基层成员形成这样的关系。正如“有机”这个词语所表示的，组织中领导和成员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运动中的‘集中制’——也就是说，它使组织不断适应实在的运动，使上面的指令符合下面的进展，不断吸收普通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充实领导机构的框架，确保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长期积累经验”。也就是说，领导不是也不能是被强加上来的，成员对领导的追随来自双方的交互和真正代表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

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

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就在于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失去了它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只不过是官僚集中制用旧日荣光所打造的一副皮囊而已。真正的先锋队所倚重的不是一套尽善尽美的组织制度，而是坚决的革命原则加上赤诚的同志关系。

二

杜临：今天我想跟你们谈一谈打倒政治现实化或“现实政治”的必要性

杨湛：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过政治现实化的定义。就我观察，那些在谈革命政治时大谈特谈“你的理论说得很好，但现实是……”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跟着群众的自发性走。所以，在我看来政治现实化无非就是自发性崇拜的同义词。

宋越阳：我认为二者有区别。政治现实化更类似于被现存结构收编，是对原则和纲领的背弃，也就是说不是推崇阶级斗争，而是迎合现状。

杜临：我同意你的判断。自发性崇拜是把革命的全部希望放在群众自身获得完满的阶级意识上去，而现实政治的最大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显然不是这样：考茨基平时用革命词句装饰自己，但最终仍然走到议会斗争决定一切的路上。他们的政治是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是妥协的政治，因而（由于它注重现存结构）是“现实的”。的确，他们对“现实”的理解非常狭窄，但我们就先从这个狭窄的意义上来谈。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政治不仅不是面向可怜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而是向未来的可能性开放和运动的，它本来就是要反对现存结构的。在这里革命政治恰恰不是现实的，是真正乌托邦的。

例如，我的一些“老朋友们”平时把自己粉饰成革命的忠诚战士，但一到女性问题和性少数问题上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反动本质。例如，他们虽然认为女性解放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但由于仅仅把革命看作生产资料和权力的再分配，因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国家机器在行政上的无产阶级化，他们把支持者比例看得格外重要。所以，当我诘问“如果 LGBT 和女性起了冲突，你们要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坚决支持女性，而这仅仅是因为“女性的人数远远比 LGBT 多”。就这样，他们和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达成了一致。实际上，现实政治就是像这样打着革命的旗号，结果却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复制现存的资本主义结构。

宋越阳：目前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也是这样的现实政治：表面上是因为有什么政治分歧而决裂，但实际上，许多团体内部的“两条路线”只是他们内部人际交往破裂的表现。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只是为了组织而组织，根本没有清晰一致的理论和实践共识。

杜临：因此，目前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或者直接一点，就是很多人讨厌的“左圈”）的存在虽然有革命意义，但它也固有逆革命政治而动的本质。左圈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革命政治的意义上取得多大成就，在目前就意味着在抛弃人缘化关系，看重思想上这一道路上能取得多大成果。

杨谌：所以为了取得一致，一份书面纲领是必要的吗？

杜临：当然有必要，但是必须把握好时机，现在写作纲领非常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书面的东西也是从平时的交往中总结、提取出来的，在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要形成一份书面文件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其实在于，一些左翼组织的成员间毫无思想连结（他们对待自己所谓的马列毛思想甚至不如过家家一般认真）、人数臃肿但实际活动人员寥寥无几、没有健康的组织机体却企图建造庞大的行政机关，在最重要的纲领问题上也不理解任何东西。这样的组织从以前到未来都不可能会成功，他们只是在不断重复左圈的历史而已。

杨谌：所以，《呼声》不是依靠某个随随便便的纲领，而是依靠类似于不成文法的共识吗？

杜临：目前能取得的纲领（共识）和法不一样，它并没有任何强制力。实际上，在网络上也不可能有某种人身强制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说到底，在目前阶段任何人都是可以想走就走的，这就是为什么更有必要从思想上统一成员。就像列宁说的，先锋队不需要任

何花里胡哨的形式民主，而是依靠内部同志的互信“自然地”得出一个领导，所有人都听从这个领导的指挥，而这个领导又随时保持同成员的健康关系。这种党内的有机关系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是某种切实的选举和行政制度，而是对这种关系的表述。为了贯彻这种同志关系，革命者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统一思想。

杨谌：但怎么防止先锋队的共同原则被资本主义的交往关系破坏掉？

杜临：这就是思想统一的重要所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会存在，也不可能通过某种手段一劳永逸地保障革命共识不被破坏。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方式尽量贯彻共识，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列宁指出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这种参与就是团结的过程。在《呼声》编辑部不就是这样吗？每个人必须积极对话交流，通过每一个个体的交际网络再把我们原则传递出去，吸收值得吸收的人。我并不是自夸，但这样的模式至少在目前是稀有的，因为它恰恰是逆各种俱乐部团体的性质而上的。正如先锋队是对无产阶级直接性的超越，萌芽的左派也必须克服自己才能向先锋队过渡，而发展革命共识正是对信息时代左派的一种克服和超越。

但是，我们仍然要意识到我们的不足。除了成员少（当然，现在这未必是一种缺点），我们乃至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都缺少一本像《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样的书。我们拥有一定的分析工具，但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分析社会总体，只能局部地观测社会现实。如果我们不能尽可能完善地分析社会运转的机制，那不会有太多大工作成果，因此在学习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查漏补缺乃至精进某一课题。不过，也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的学

习水平不够就缄默不言，平时要多进行写作活动，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来建设；这个作家不是文学的，而是战斗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让别人听见我们的声音，要一直言说，而不是一直让别人言说，这正是所谓“党人”的意义。不过，作家不是只能通过写文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对话同样可以：事实上，对话正是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文本。作为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时刻都在书写自己的轨迹和思想，一个人在某个聊天群或者朋友圈输入的文本正是对他自己思想的书写，要把这样的书写改造成服务于我们事业的战斗，而不是止步于好友之间的消遣。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群体中推进组织建设的思路也清晰了起来：在目前的朋友圈子中推进自己和他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的认识，成员不断扩大，最后才结成组织。组织不是开端，而是活动的结果。有的人要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圈子设定为完备的组织，这恰恰违背了黑格尔的教诲：我们要从无前提的开端出发，而不是设想自己一开始就坐拥一个庞大的革命组织或者同志群体。

第二部分

实践中的知识分子

作为流放者的乔治·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是一个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的人。在他的祖国——英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与他的作品，《1984》等一系列作品在冷战期间被有意地发掘出来，作为“反政治极端”和“反极权主义”的样板和反乌托邦的标杆竖立在北约集团上空。至今，英国中学的GCSE文学课程仍然可以找到《动物农庄》这部经典作品。

在中国，关心政治的任何人几乎都熟知大名鼎鼎的《1984》及其对极权主义社会的苦涩描述和“英社”向我们昭示的压抑图景，比起这些，它本身的文学色彩倒是微不足道了。书中政权和作为“置身事内”的反抗者的主人公的形象吸引了相当多对中国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政治关切者——他们正是《1984》和（较小程度上的）奥威尔作品的主要受众。这个群体里既有左边的所谓“自由社会主义者”，也有来自右边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都试图在奥威尔的这一著作中找到与历史上和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相关的东西，并且从字里行间苦苦找寻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反思。比如，经常有人将目前中国的领导人比作书中那个神秘的“老大哥”，然后逐一对比中国和书中政府政策的相同点。

但是，左右两翼对奥威尔的解读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保守主义者的反革命解读自然不消说，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解读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只会谈论“权力之恶”，却不思考权力的来源；他们总是恐惧“老大哥在看着你”，却不考虑现实统治的根本。更重要的是，他们只管肯定奥威尔谈论的是共产主义的魔鬼，却忽视那些作者所隐喻的资本主义要素。他们当然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也不会想到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脱离阶级叙事一样，资本主义的正统保卫者也无

法抛弃形式民主和自由选择的神话。为了抵御自己创造的共产主义老大哥，他们就针锋相对地生产出来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老大哥”。我们享有自由！不危害现存社会的……自由！

与之相反，所谓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倾心于把“极权主义之恶”看作列宁主义的天然缺陷和必然逻辑结果，并且从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提取出来，声称《1984》和《动物农庄》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对极权的列宁主义的批判。正如奥威尔借温斯顿之口所说的，“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那里，一个非1984式的出路是有可能的。通过探索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路线，他们真诚地相信一种新的无产者阶级能够自主地——从而也就是反列宁主义先锋队地——成长起来，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统治形式，开创真正的自由社会。他们认为，奥威尔的另一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佐证了这一观点，即一种无政府主义实践是可行的。因此，他们坚称必须反对极权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先锋队，也就是说要坚决地同列宁主义的旧政治传统（无产阶级专政和先锋队）进行彻底清算，这样才能让无产者自动地、自发地爆发出自己的希望。

这两种态度显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的：前者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态度，后者则是早就被列宁本人批判过的自发性的其他形态。正如我们在《呼声》第三期谈到的：“将文艺放置在社会历史中（因此是人的实践物）看待是理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基础。”如果不把奥威尔及其作品放置在历史中讨论，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讨论出作者本人的意图呢？

在我们看来，**奥威尔是一个流放者——政治的流放者和阶级的流放者**。早年间的他作为英帝国殖民秩序的守卫者生活在缅甸，而后作者记

者辗转于西班牙革命中，最后作为一个小说家死去。在人生的旅程中他似乎游走于各方，但实际上却是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奥威尔一方面继承了萧伯纳、狄更斯等人对工业主义进行批判的文学传统，因而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尖锐态度：“例如，所有敏感的人都憎恶工业主义及其产物。”奥威尔还更进一步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始终予以关怀，并且多次在作品当中赞扬工人阶级的“希望所蕴含的”那些东西。他试图直接从工人当中寻找某种形式的乌托邦因素，并且期望这个新阶级能够打败他所厌恶的工业主义。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作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奥威尔深受切斯特顿、卡莱尔乃至整个 18 世纪英格兰浪漫主义遗风的影响：

可曾圣城于此升起
在撒旦的黑色磨坊之旁？

自然，浸润于这种传统里的奥威尔也自始至终对无产阶级和其政治行动保有谨慎的态度，这也就是他的阶级流放的开始。在奥威尔的设计中，《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也成为了一个流放者：他是英社党的流放者和政权的流放者，是与老大哥（曾经）分了手的情人。这和奥威尔本人又是何其相似？一个英格兰的流放者和无产阶级的流放者，是与资本主义（曾经）分了手的情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奥威尔穷极一生都在试图摆脱腐烂的依附心态。他曾试图将自己一分为二。奥威尔的一半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营里置身事内，另一半则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任何一个随遇而安的“原子”一样置身事外。这种分裂的知识分子心态影响深远（也许，瞿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是如此？但毫无疑问，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比奥威尔要坚定得多），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也是这样吗？一边喊着震天响的口号，却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时刻都偷享原子化个人的自由。

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奥威尔式的知识分子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属。自由的流放者的本质让奥威尔一样的人无法接受列宁强调的“无产阶级纪律”和无产阶级的血的专政，但对社会主义显示的更好的未来，他们又怀着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希望在无产者身上”，这句话在《1984》中出现了两次。“……你们葬身黄土，他们拥有未来。但是如果你们能保持心灵活力，还是能够与他们一起分享未来的。”他希望无产阶级能够成长、组织、运动、革命，最终击溃老大哥及其政权，但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一阶级，而这未来的希望也被放在地平线处，甚至要在“葬身黄土”后才会出现。**希望不是现存的希望**。奥威尔忽视（或者干脆说是抹杀）的正是可以把希望创造为现实的实践力量，在他那里，人及其实践的地位是没有的，毋宁说，**无产者及其实践是同知识分子无关的**。这就是奥威尔和他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失败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的高尚催促自己批判这个社会（在奥威尔那里是工业主义社会），对自身地位窘境的认识也让他们隐约感受到资本主义所蕴含的矛盾，却又不愿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不希望自己成为从属于无产者的“有机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所言）。他们同自己寄予厚望的新阶级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完全没有把创造新社会当作自己的任务。自然，当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作时，这些批判的传统知识分子就陷入了恐慌。这就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一批批知识分子在传统和现实的号召下自愿卷入社会主义的浪

潮中，其中的幸运儿——费边社、修正主义者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了群岛和海洋的改造者和治理者。虽然他们真诚地相信通过教育和鼓动就可以让穷人站起来，但这面旗帜下的工党和英国共产党却陷入现实政治、选票和政务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那些不幸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个奥威尔，事业的幻灭与对工人阶级革命政治的慌乱导致他们——在短暂或漫长的分手之后——重投旧秩序的怀抱。其中恬不知耻者叫嚣“反对革命是因为我曾在深渊里挣扎”，更沉郁者则在厌弃政治的玄思里悄然逝世……**他们害怕无产阶级的政治建设终结自己知识分子集团的存在。**

撒切尔和布莱尔上台了。那些受共产国际“人民阵线”策略欢欣鼓舞，投入西班牙战场的年轻人垂垂老矣，就像肯·洛奇《土地与自由》的镜头一样：年轻时，他们从西班牙带回一捧同志墓前的黄土，而当他们已然老去，自己的后代将从遗物里一窥世界年轻时的模样。那捧黄土随着知识分子和时代一同下葬，同样躺在棺椁里的，还有新社会的最后一抹希望

宋越阳

在法西斯主义阴影下： 贾科莫·布拉内洛的共产主义之路

在任何时代，整体的进步都会被个体的偏见和利益阻碍。无知者怀有偏见，犯罪者维护私利。而在今天，天下大同（我就不说人类幸福了）的主要障碍当然不是无知：而是个体和犯罪者的利益和野心。这些人（或者这些人中已经攫取并准备保卫自己战利品的那部分人）总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当民族意味着文明时，他们是爱国者最恶劣的敌人；而在民族已经意味着反动的今天，他们是民族最强悍的勇士。——《贾科莫·布拉内洛日记》，1939年10月19日。

如果说在反法西斯力量的历史上，1938年是西班牙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会议、列昂·勃鲁姆的人民阵线走到尽头和意大利颁布种族主义立法的严酷之年，那么在意大利的四个年轻人（他们分别是贾科莫·布拉内洛、瓦尔特·费拉克、奥塔维奥·加莱阿佐和欧费奥·拉扎雷蒂）的友谊史上，这一年则是他们私人图书室诞生的书籍之年。

布拉内洛从1938年开始写日记。这本日记一方面是一面忠实地映照朋友和妈妈的镜子，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他个人的读书反思。这些反思是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从而赋予生活何种意义为中心的。

“我想确定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在生活中该怎么表现”，他经常这样对欧费奥讲。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布拉内洛这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已经在形成自己的心灵，这让他在认知上扩大了狭隘的学校视野，

在更广阔复杂的范围内寻找更普遍的动机。这部分地也是由于“共产主义”和“阶级”在1938那一年对少年们来说已经有了确切的含义——他们坚信自己属于一个比朋友圈子更广泛的现实：布拉内洛用复兴运动时代的术语称之为“信仰的同志”。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富有智识、激情和生命力的男孩。1938年6月25日，学校的结课庆典是到莱科山旅行。布拉内洛在日记里说在这里他们谈论万事万物：鲜花、芳香、“因薄雾而变得诗情画意的景致”，抑或宗教等等。他指出在这个圈子里有各个阶级的代表：他自己的家庭属于工人阶级，欧费奥·拉扎雷蒂在职员阶层之列，瓦尔特·费拉克的父亲是工程师，加莱阿佐则是小商人之子。这几个少年从前几个月研读讨论的书里面了解到社会被分为对立的阶级。布拉内洛努力地想要回答那个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他在复兴运动的传奇的主人公里面寻找自己的模板，并对自己、朋友以及卡西尼实科中学（在这里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的老师和校长进行具有批判和自我批判特征的无情分析。学校有一位来自卡拉布里亚¹的老师安东尼诺·罗西，他是热忱的马志尼主义者；罗西对自己的这位学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布拉内洛的灵魂中扎下了热那亚爱国者²最高教诲的根：思想和行动必须合一，政治是一种使命。但正如那些才智卓越的人物一样，无论导师的桃李如何盛开，学徒的批判精神从不会更弱小。罗西曾经回忆道：“有一天在讲地理的时候，我说赤道把地球分成两个半球，然后把它的长度也标上了。他[布拉内洛]问我赤道的长度是

¹ 意大利半岛最南部的大区（行政级别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

² 这里指同是热那亚生人的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是意大利著名爱国者和共和派革命家，在早年间就加入了意大利的烧炭党，一生致力于建立共和制的密谋活动。1849年与他人共同领导了罗马共和国，后来曾同第一国际联系。马志尼毕生的信条为“上帝与人民”，因而反对马克思主义，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判。——译者注

怎么测出来的。我说现在太晚了，明天再把这个补上。”

再说回他们高中那段青春期吧。对卡西尼中学的其他人来说，贾科莫、瓦尔特、奥塔维奥和欧费奥是“桑皮耶达雷纳¹的那伙人”。所以在热那亚市中心，他们的参照点通常是托洛兹书店和柜台广场的二手书摊。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图书室（费拉克的除外），在桑皮耶达雷纳这个卓越的工人街区，一连串的读物交换和激烈讨论是在多梅尼卡·邦迪——贾科莫的妈妈，布拉内洛家的保护神——的厨房里发生的。在那个简陋朴实的厨房里面，主角们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上演了一出热那亚版本的《母亲》（高尔基的名著）。多梅尼卡是个个性鲜明的女人，她与儿子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自己也进入了贾科莫的学术、意识形态和政治探索中，和他一起学习、钻研和成长。布拉内洛从阅读中汲取了一个日益清晰的设想的质料和理念，对他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个设想完全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他后来才同共产党和铁路工人代表埃米利奥·古埃拉的会面）。这个设想包括：领导工人阶级对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1938年9月13日，他在日记中说墨索里尼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对失去自身位置的恐惧之上的庞大机器”，只有有人挺起胸膛以身作则，这个机器才会“不可避免地被粉碎”。“以身作则”：这就是贾科莫给自己选择的人物。为了达成这项任务，他锤炼着自己的品格。

于是在多梅尼卡·邦迪的厨房里，布拉内洛通过阅读杰克·伦敦、左拉、拉布里奥拉、克罗齐、达尔文、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曼佐尼、多梅尼科·塞滕布里尼、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阿纳托尔·法朗

¹ 热那亚一个街区的名字，距离卡西尼中学将近5公里。——译者注

士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著作而成形。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合法与（法西斯主政所导致的）非法出版读物的地位越来越高，它们注定要在布拉内洛和聚集在其周围的桑皮耶达雷纳共产主义学生核心班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我不记得有谁给我们提供任何经验，也不记得有什么模型导向或者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形塑。对阅读的热爱带来了这一切。”上世纪 90 年代，奥塔维奥·加莱阿佐证实了令代表 OVRA¹调查“学生颠覆团体”的热那亚警察总署政治处专员阿尔弗雷多·英格拉西亚大吃一惊的情况。由于被警察发现，1942 年 10 月 11 日，家庭主妇多梅尼卡·邦迪和安萨尔多工人朱塞佩·布拉内洛之子，时年 21 岁的工程系学生和第 15 工兵团少尉贾科莫·布拉内洛被捕。多疑的法西斯专员在整合着一条条调查线索时不禁吃惊：彼此几乎断联的散兵游勇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旧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重新联系起来，将其改组为一个高效的组织”？

布拉内洛正是 1942 年在基亚瓦利的王家军队服役期间成为了领导人。这意味着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求的时刻已经到来——马志尼所说的“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时刻，或马克思所说的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时刻，或者就像布拉内洛自己说的那样，是“认真做事的时刻，而‘认真做事’就意味着建立党和党组织。”在这方面有一则轶事很好地显示了布拉内洛通过政治和信仰训练逐步获得的决心和信心。这次，奥塔维奥·加莱阿佐给我们讲的是他们这对朋友兼同志转狱期间的事情：“在带我们去阿普利亚的火车上碰巧有位宪兵队长，他们这种人一般都比较爽快，他到车厢里面就跟我们闲扯。对我这个和贾科莫拴在一

¹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秘密警察，其官方名称至今尚未确认，甚至连 OVRA 是否是某种名称缩写也不能确认。——译者注

根绳上并且还目睹整个对话的人来说，他给人一种准备得相当充分的印象。那个宪兵队长走了之后，有一个听到只言片语的宪兵就过来跟我们说：‘哎，您在队长身上下过功夫……’而贾科莫回答道：‘对，不过还不够。’”

当时也在基亚瓦里服役的年轻军官达里奥·普契尼¹（他也许是 20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西裔意大利语作家）结识了布拉内洛，用某种“参考书目”的方式——在法西斯诞生的第 19 个年头，两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斗分子就是这样识别对方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证词：“我偶然和布拉内洛见了一面……当时我们是驻扎在基亚瓦里的同一个团的少尉，随时有可能开拔。我们住的是两个挨在一起的带家具房间。我们基本上不打招呼，因为军事上的强制共事已经太久了。有一天我因为头疼到处找药，看见他床头柜上有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就是我想和他谈话的第一个念头。这本书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因为这是 1919 年的老版本，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年代是买不到的。我当时觉得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然后我就把拉布里奥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掏了出来（从手提箱里面拿出来，放到床头柜非常显眼的地方）当作答复，这本书的附录是《共产党宣言》。布拉内洛很快又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有力地回答了我，至于我就把托洛茨基的两大卷《俄国革命

¹ Dario Puccini (1921.1.5-1997.3.5)，西裔意大利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研究西裔意语文学和西裔美国文学的主要学者之一。青年时代参加罗马的抵抗运动，1942 年被法西斯逮捕。1956 年签署了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声明。翻译了众多西语文学，与聂鲁达、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关系匪浅。其父马里奥·普契尼 (Mario Puccini) 也是一名意大利语作家，在 1921 年写作了《无政府状态万岁》(Viva l'anarchia)，这本书在 1930 年以《没有领袖之时》(Quando non c'era il Duce) 的标题再版。——译者注

史》拿出来用了。我这么回答他可不是想吵架¹，其实是因为我带的书比较少，那些《前进报》或者热那亚、都灵的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出版社出版的珍本在罗马根本买不到。如果对话突然停止，我相信那肯定是‘参考书目’的缺陷。那种从试探到真正思想对话的转变不容易，但却美丽而让人兴奋。我们的友谊很快变得坚固、快乐并且非常活跃。他逐渐让我接触到热那亚革命团体的潮流，他让我的眼前闪耀着波尔塞韦拉河谷²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我来说这是一场启示……”

鉴于这些前置说明，不难理解为什么布拉内洛的共产主义学生核心同共产党秘密小组（它在历史上的代表有阿图罗·德莱皮亚内、埃米利奥·古埃拉和拉斐尔·保莱蒂等人）之间实际上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而且这些冲突不只是组织性的，还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只需要考虑布拉内洛设想的假设就知道他们两个阵营的差异有多大了。他认为战争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并且会在短时间内导致革命局势的出现。从这个前提推出来的逻辑结果当然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战斗组织。布拉内洛在1942年6月写道：“我们预先声明，我们的非法组织是为革命、暴力和战斗行动建立的。因此它必须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必须是一支时刻准备斗争的青年军事力量。经验教导我们，那些因政治警察的监视不敢动弹的、被迫害压垮的、在被迫碌碌无为中沮丧和生锈的以及在陈旧的合法化政党中僵化的老共产党员全都不能在目前正形成中的非法组织中充分开展活动。因此，他们必须在非法组织的边缘聚合起来，听从

¹ 达里奥·普契尼说这话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打为资产阶级叛徒，而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始终支持斯大林，只有特雷索等人的“三人反对派”和葛兰西除外。——译者注

² 这是当时热那亚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译者注

它的领导，帮助它开展工作，积极地进行个人宣传，努力培养新的共产主义者，把它指示给年轻的同志们，给党提供财政贡献，但不参加党组织内的非法工作。在行动时刻，当战斗打响，当我们公开直接地攻击法西斯警察时，老共产党人将能够和青年人携手介入其中，并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给予后者宝贵的帮助。”

如果用现在的政治事件粗略地对比一下，人们大概会觉得布拉内洛想用一个新组织“废除”旧的党组织，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老变化，而是关乎革命设想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人”，布拉内洛澄清道，“哪怕 50 岁也可以年轻，但也有可能 40 岁就是老朽。一个人在自己希望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的。”他的设想唤起对年轻的要求，要把战斗的共产党人的“历史”部分排除在新组织之外，但他准备欢迎所有赞成“学生”路线，即布拉内洛革命路线的人，而无论年龄大小。政治和战略分歧显而易见，布拉内洛在 1942 年初夏起草的《关于组织的通知》中的一系列修辞问题确认了这一它。为了实现唯一可行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工农兵委员会共和国¹”——如果只要让自己“意识到……我们内部的……这些力量”并用“以革命智慧”发挥它就行了，那为什么还要寻求复杂的同盟？为了到达这个目标，需要一个“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完全由共产党员领导，不被那些在最后关头瘫痪行动和损害所取得的胜利的无关人员所阻碍的组织”。利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布拉内洛列宁主义地预言“永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

¹ La Repubblica dei Consigli di operai, contadini e soldati, 最早把 consiglio（委员会）一词引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的葛兰西是直接把这个词当作 *comité* 的对应译名使用的。因此这里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当然，词组里的单词是完全意大利化的，而不是像列宁在共产国际中批评的那样“说了太多俄国语言”。

——译者注

总而言之，如果说鲁杰罗·赞格兰迪描绘了他那代人中一部分人“穿越法西斯主义的漫长旅程”，那么也可以说在热那亚西部的无产者和群众中，全面和彻底拒绝法西斯主义及其神秘化而支持共产主义的“学生布拉内洛”及其同志恰恰是“穿越法西斯主义的短暂旅程”的主角，他们也是前者的同代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是出于对现实、文化和人性的热爱，并且作为一个小圈子的智识和道德表现成熟起来。

“学生们”既寻找共产党人，进而也探索共产主义，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二者都是情感和理想最高的具体表现。如果是共产主义是在书本中被寻找到，然后通过他们那十分劳累但富有激情的图书室大建设而形成的，那么共产党人则不仅表现出热切和人道的友爱之面，也有宗派主义和通世者的溃败之面。这就是为什么布拉内洛在列宁主义赋予共产主义的形式中发现了这些局限和偏移的解药良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党”的政治主体性同马志尼式伦理倾向以及他对缺乏革命精神的同志的无情批判在其思想人格中毫无保留地结合在一起。“穿越法西斯主义的短暂旅程”孕育了完全自我生成的激进反法西斯主义经历，而这将构成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序幕。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才能找到这种斗争自然的先锋队，并在社会主义中合逻辑地实现，当然了，这个“只有”的前提是希望避免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谈到复兴运动时说的那样，即使抵抗运动也将是“一场使国家出于腐败和不断危险中的未完成的民主革命”。¹

¹ 1954年在拿坡里发表一次演讲时，彼得罗·塞奇亚接受了拉布里奥拉关于复兴运动的这一断言，并将其作为对抵抗运动的评价。塞奇亚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抵抗运动时任加里波第旅政委。他在意大利共产党内偏左，由于经常反对陶里亚蒂的方针，50年代后逐渐被边缘化。——译者注

深耕者与鼓动家：中国农民大王彭湃

1922年11月，广东一个叫海丰的小县城召开了一次农民集会，一个年轻人在震天嚷声中烧掉了手中的田契铺约。田契的火星四散纷飞，农民运动的烈火也以燎原之势点燃了海丰乃至整个广东。此人便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先驱与骨干，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彭家是当地有名地主家庭，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但彭湃在这个封建家庭内部却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彭湃乃是庶出，他的母亲周凤原是一个婢女。在嫡庶分明的地主家庭里，彭湃和他的母亲免不了遭受歧视，这使彭湃更为容易同被压迫得不能呼吸的海丰人民结合起来。20世纪初，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侵入传统社会的总体性危机，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反帝爱国情绪在成为了比较主流的意识形态。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彭湃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并且积极参与各种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求学，于1918年9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先后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毕业返粤，经谭平山介绍入党。

在从海丰和东洋获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后，彭湃从地主家的少爷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与践行者。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大幕即将拉开。

海丰，这个位于粤东南的县城并不似他的名字一样富裕：地主和军阀横行，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海丰群众经受多方压迫与剥削，生活十分困苦，大量自耕农破产。严重的阶级矛盾以及乡村治理的崩坏为海丰农民运动的展开提供了土壤。1922年五月，时任在海丰县教育局局长

的彭湃刚被免职，旋即于六月深入到海丰城郊的赤山约，开始从事农民运动。起初，作为留学生的彭湃说话“太过文雅”，而且“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这些细微处都使他与农村和农民格格不入，因此收效甚少。于是彭湃改穿朴实衣服，并且化用在日本习得的演说鼓动法，专找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去宣传，经过月余的努力，终于在七月底成立了赤山农会（六人农会）。

然而，农民对他的减租、互助等理论虽然深感兴趣，但不敢加入农会。经过一个多月只有三十几个农民加入了农会。彭湃回忆，此时“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什么都困难”。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农会通过解决一系列问题，赢得了农民的支持。首先，农民之间常常争夺佃权，地主正好可以借农民之间的竞争来更换佃户和加租。农会就制定了一系列规则，通过集体抵制地主转让土地租佃权、农会会员互帮互助乃至集体罢耕等手段，调解了农民间的竞争，也使地主不敢再轻易加租。其次，农民要用船向城里送粪肥，城里的土霸就强收码头费，农会就出面逼迫土霸取消码头费。第三，农民的内部争端常常以土豪士绅为中介在官府打诉讼，导致农民经常因诉讼费和被勒索而破产。农会为此定立规则，要求会员的争端必须由农会调解。农会对这三个日常问题的应对大大激发了农民对农会的支持。

到 1922 年秋，每日已经有 10-20 人申请入会，农会势力大大扩展。而本篇开头所出现的彭湃烧毁田契铺约的一幕更是他在农会发展中宣传鼓动实践的一次高潮。就这样，在彭湃和农会会员的不懈努力下，赤山农会逐渐壮大，影响力也一天比一天大，附近村的农民相继成立了农会，甚至“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这给海丰县总农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海丰总农会在 1923 年 1 月成立，会员有 10 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农会设立了文牍、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庶务、教育、卫生九个部门。与此同时，陆丰的农会也迅速发展，农会已然成为了一个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重要乡村治理机构。

1923 年元旦，彭湃仿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和《赤山约农会章程》，确立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同时公开宣布“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这意味着海陆丰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由改良走向革命的阶段，即以反对封建制度和夺取地主权力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斗争的阶段。

尽管彭湃在 1921 年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和当时以工人运动为核心指导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策略上仍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施存统就曾经这样讲：

他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强调农民运动，对工人运动似乎重视不够。据我所知，他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比我们任何人都早。他对党是表示支持的，但跟党的意见不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彭湃当时对于农民运动的关注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工人运动为核心的路线方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彭湃都没有收到省委的指示，而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自己的组织依托，通过不断整合地方资源展开革命工作。当时的团组织作为发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革命组织，与彭湃自身强烈的“发动群众”的宣传理念有着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彭湃在最初组织海丰农会时承认“这章程完全仿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像《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写的那样，彭湃早期组织的农会重在“谋农民生活之改造、谋农业之发展、谋农村之自治、谋农民教育之普及”。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组织依托的彭湃用在西方教育中习得的演讲、集会、组织农会等宣传鼓动方式，开始了革命的“深耕”进程。

1923年7月26日，海丰遭受了台风的袭击，当地粮食生产受到重大影响，因为当时恰逢收获水稻的季节。台风发生后，各地农民纷纷向农会求助。8月5日，在彭湃的主持下，海丰县农会在海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讨论受灾农田的缴租问题，会议议决：“以三成交租为标准，如收成不及三成者，照数递减；全无收成的，则免交。”8月16日，时任海丰县长王作新以“农民抗租”为名，派军警300多人包围进攻农会，抓捕农会会员20余人，解散农会，通缉彭湃，此即为七五农潮。之后，在陈炯明及其他地方官绅的镇压下，海丰农民运动陷入低潮，而彭湃也被迫离开海丰出走至广州。

尽管因运动受挫而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海丰，彭湃并没有放弃自己“深耕”革命的进程。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开始日益重视农民运动，而改组后的国民党也对农民运动采取了支持政策，专门成立了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祖涵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年8月，中共广州地委也正式成立了以阮啸仙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农民运动事宜。在广州任职期间，彭湃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第一届主任。彭湃最初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曾充分利用其在地方社会的精英身份、家庭地位，以及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和人际网络。而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各地革命者均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每个人在其家乡熟人社会的圈子毕竟是有限的，革命的范围一旦扩大，熟人社会的圈子势必被突破，当群众运动需要于短时间内在一省或数省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时候，这样一种熟人网络模式便显得十分低效。彭湃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这便是他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因所

在。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批量”培养农运人才，其效率大大超过个体的熟人网络模式，到了第六届农讲所，负责人变为毛泽东，生源也从粤、湘扩大到江西、湖北、山东、河南等省份。在学习内容方面，农讲所既是一个讲授社会主义以及农民运动相关理论的理论培训组织，同时也很重视理论的具体实践。农讲所的培训尤其侧重组织宣传方面能力的培训，每届农讲所都会安排学生进行实习。这些实习内容既包括向当地农民进行宣传，也包括协助某地方完成农协的组织与建立。除了重视组织宣传能力之外，重视军事训练是农讲所学习内容的另一重要特征。从首届农讲所到第六届农讲所，尽管参加的学生人数、主要教员乃至课程都有变化，但军事训练一直都保持下来，这是由于“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

经由这样的培训，农讲所培养出来的农运人才更多地具备了组织动员与宣传鼓动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宣传鼓动方式直接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以调动农民的革命性，从而成功发动农民反抗地主阶级。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学员，在从农讲所毕业之后，往往成为特派员，直接进入基层乡村，成为重要的农运干部，对农民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彭湃依旧对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十分关注，1923年七五农潮之后，农会曾经建立带有一定传统秘密会社的色彩的十人团，以开展秘密活动。彭湃敏锐地把握到这一动向，并于1924年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彭素民的信中明确提到了“十人团”这样一种组织方式：

据称现在该处农民秘密团体(即十人团)日甚发达，组织日益严密，训练宣传较之从前公开更为有效……敬请部长将此事提出中央，请求中

央经济之援助，大约每月五十元，并使吾党与该处农民发生密切关系，至为重要。

七五农潮使彭湃意识到，单纯依靠青年团的组织方式和宣传手段以及农会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很难在面对地域社会中浓厚的宗族传统、强大的地主势力以及有着大量武器人丁的地方民团的时候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讲到：“我以为青年团只可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是很秘密的。”十人团这一严酷革命情势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为彭湃提供了改革农民运动组织方式的线索。另一方面，彭湃又两次赴广宁指导受阻的农民运动的开展，并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了运动的胜利。海丰及广宁的经历推动了彭湃改革农民运动组织和通过农民自卫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的发展，《团区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了十人团乃是农民协会的重要组织形式，而农民自卫团的主要成员更是来自十人团：

农民协会在国民政府治下，宜从速组织农民自卫团，姑无论目前有无枪支亦须组织，其分子以十人团中的分子选择之。……农民协会之会员，应择其最觉悟之分子，组织十人团，为全会之骨干，并须常常开秘密会议，有时虽无秘密之必要，亦须绝对秘密，此为秘密性之训练，以免将来临时措手不及。十人团之入会应设誓或其他表示，尽忠于无产阶级之服务形式，如识字之会员则使其签字。

彭湃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对传统秘密会社中的组织形式加以充分利用和改造，以此完成革命的底层动员，进而实现了革命组织从“宣传的机关”到“革命的团体”之转变。

1925年2月19日（澎湃当时30岁），广宁农民反对地主的武装

斗争胜利结束，彭湃赴东江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随着东征军的快速推进，海丰在二月底便被攻克，纳入国民政府治下。而彭湃随先头部队进入海丰后，立即开始组织海丰各级农会的恢复和健全工作，海丰农民运动随之复兴。除却对农会工作的贡献之外，彭湃还格外重视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建立，此前的斗争经验使他认识到，党组织这类严密的革命团体和农民武装是农民运动在严酷环境下得以开展的根基，因此彭湃为建立共产党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而促成了中共海陆丰地委和海丰农民自卫军的正式成立，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组织不断发展，农民自卫军也日益壮大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后，彭湃继续活跃在广东农民运动的阵线之中，从海陆丰到普宁、曲江，从国民党农民部到农讲所，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尽管领导广东农民斗争的日子十分繁忙，但彭湃始终不忘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1926年1月起，彭湃所著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陆续在《中国农民》期刊上发表并刊完。在这个报告里，彭湃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海丰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并区分了农民和地主两大营垒，揭露了农民受到压迫和剥削的现实。其后他又以主要的篇幅对1922年至1924年海丰农民运动的经过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从农民的发动与组织，农民组织的建设，斗争的策略等多个方面对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基于此，《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了当时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瞿秋白把这本书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相提并论，他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样。”

随着国民革命持续展开，彭湃于1927年3月北上至武汉，在全国农协中开展工作。在那里，他旗帜鲜明地和毛泽东、方志敏等人站在

一起，主张彻底的土地革命，同时利用自己在广东领导农运的经验培养了一部分农运人才。

此时，北伐大军高歌猛进，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仿佛中国的新生已经可以记日而待了。然而，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不断壮大，国共两党已然行至分裂的前夜，马上，彭湃又将投入新的革命风暴之中去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为了抵御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屠杀并夺取政权，海陆丰在4-10月爆发了三次武装起义，尽管彭湃因为武汉方面的工作以及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而未能直接参加这三次武装起义，但海陆丰地区革命高涨的形势，同彭湃当年艰苦创立农会，组织农民、发展党组织和农运干部以及武装农军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天，彭湃又发表了《土地革命》一文，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的思想主张，其次，他还指出了武装起义后的任务，他认为，应当积极的运用革命暴力，扩大工农武装，并“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干净”，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该年11月，彭湃在第三次起义胜利后返回海陆丰，担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开始负责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这一首要任务。他积极的进行宣传工作，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1月18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海丰城内处处悬挂红灯红旗红纱，整个海丰县城几乎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大会期间，讨论通过了多个重要议案：《没收土地案》《杀进反动派案》《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士兵生活案》《妇女问题案》等等，并且通过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而在闭幕大会的演说中，彭湃

面对反动势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现状，再次强调了以革命暴力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

每个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杀到汕尾港马官港的水都成赤色，各兄弟的衬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得通红……我们最后一句口号：赤色万岁！

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彭湃旋即投入到各项新生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工作当中。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和发展似一颗钉子一般，不断刺痛着国民党的神经。从 1928 年 2 月下旬起，国民党粤桂军阀不断围剿海陆丰。因力量悬殊，海丰、陆丰相继失陷。1928 年 3 月，彭湃等率领红军和工农革命军转战大南山。坚持了 4 个多月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结束了。

1928 年 11 月，彭湃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上海，继续在中央进行农民运动及军事等方面的相关工作。1929 年 8 月 24 日，彭湃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30 日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 4 人一起英勇就义，时年 33 岁。

如果要对彭湃的一生进行总结的话，那么“深耕者”与“鼓动家”的评价无疑是十分贴切的。他深耕于广东的乡村之中，将农民运动带入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并力图使农民成为自为的阶级以及革命的主人。他将高高在上的理论化为具体的动员实践。不仅以烧毁田契、身穿农装与农民同吃同住等方式完成了自身“走向民间”，真正站在群众之中的过程，还尤其注重通过充满情绪渲染的动员方式，将抽象的理念与观念转化为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农民能够明白的日常话语而完成鼓动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来组织革命力量。他旗帜鲜明的主张对革命暴力的积极运用，以这种诉诸冲动的方式向旧秩序发起冲击。尽管彭湃 33 岁

时便去世了，但他开辟的农民运动道路，留下的组织、鼓动和斗争方式，以及在农讲所撒下的诸多革命火种却使他获得了另一种“死后生命”。他是真正点燃革命烽火并将此火高高举起的人，纵使屡遭扑灭，但火星仍在，直到大火燎原的那一天，彭湃的理想也不会远去。

吴振熙